

安全化理论与话语秩序的建构

纽约大学 于博轩

内容摘要

随着国际局势和国土安全在冷战后迎来了重大变局，安全概念与安全威胁的维度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相应的，世界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应对也不再是局限于传统的扩张军备或强化社会治安力量。粮食、气候、能源、网络许多领域都在被冠以安全之名并开始被国家以更集中的资源和更强化、更多样的手段进行管理。在国际关系学界，具有建构主义色彩的安全研究也步入了人们的视野，以巴里·布赞、奥利·维夫等人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创新性的引导了一场跨学科范式的浪潮，丰富了安全研究中的对象及角度，将国家社会进行分层并借鉴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范式来分析与安全问题相关的政治行为变迁。本文的研究将对奥利·维夫的安全化理论进行再思考，重新结合多学科理论来探讨国家安全观在政府及群众间的建构与影响并最终赋予安全政策正当性这一机制。

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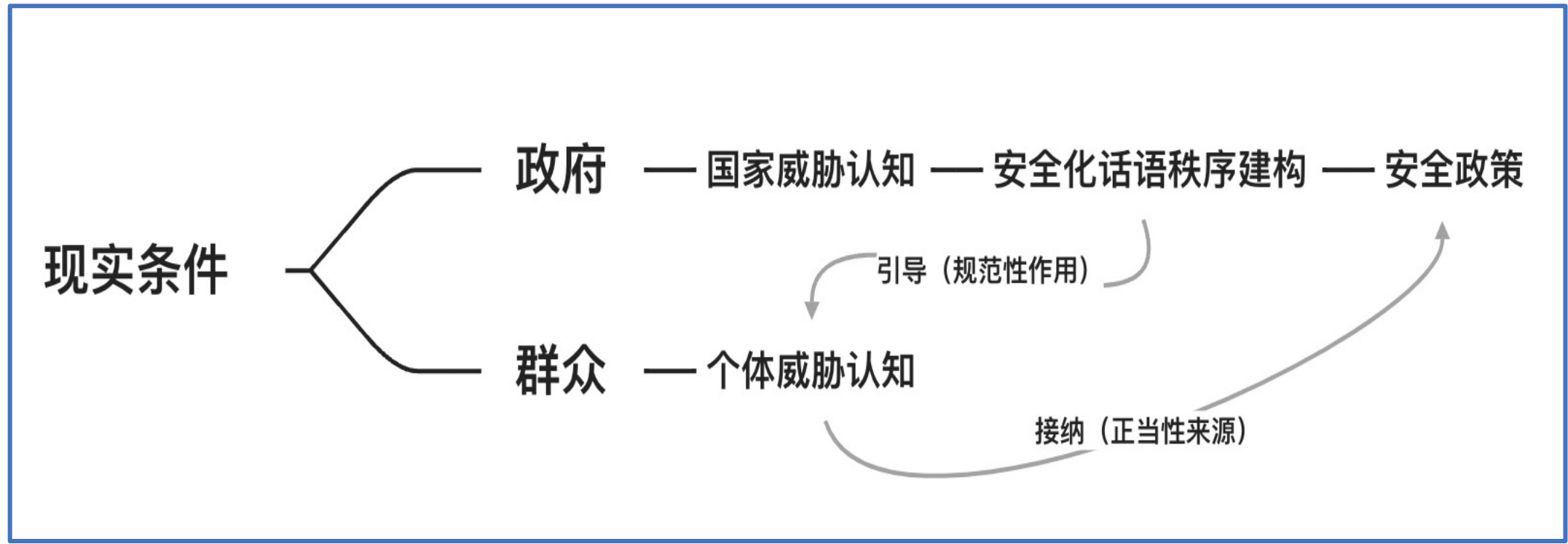
近年来，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安全问题频繁地在国际社会中论及，而各国政府与民众对安全的顾虑也显然不仅仅是局限在看似与多数人保持着距离的军事安全问题上，安全的新论调正在走入越来越多人的视野中，比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等。在过去，粮食及能源问题往往搭配“供给”“危机”等词汇出现，但随着粮食及能源等问题被冠以安全性质，国家内及国家间便开始出现更具多样性的应对手段，例如联合国对“粮食不安全”问题的标准化、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国家耕地管理及市场调控等一系列指标和政策。除了粮食、能源安全外，网络安全、环境安全等等领域也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愈发受到重视，而尤其是在环境及气候问题中，国际条约和立法活动都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外交影响因素浮现。而在中国，自2014年起，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被提出，也在此后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人民安全”、“制度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多种多样的安全问题被纳入了考虑，尽管其中的许多词汇是我们一直熟悉的，但当他们被附加上安全后，其实际内涵便显得有些陌生，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概念已然成为了我们社会中的重点关注对象。

因此，为重新审视并思考安全概念及政策的变迁，我将依靠奥利·维夫的安全化理论为核心并根据实例引入国际安全观和政策革新的历史，同时尝试在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论上探究安全问题的认知是如何在政府及群众间通过一种话语的秩序来呈现并使之在意识层面深化。

安全化理论

在20世纪90年代，安全威胁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了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经济危机、社会矛盾、犯罪率攀升、恐怖主义、环境灾害等种种问题不断冲击着国际社会的安全观，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传统安全观的军事问题重心不在足以解读各国领土上所面临的问题，因而促成了诸如非传统安全观、人类安全等新概念的引入。于此期间，以哥本哈根学派所提出的安全化理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范式逐渐形成，这一系列研究范式尝试着重新思考安全的本质，即何种事物会被个人乃至国家视作安全的威胁，并会以何种措施来应对这样的威胁。安全化理论的提出者奥利·维夫认为，安全化即是“将某种事物视作存在性威胁（直接影响国家生存状态的威胁），继而将此事物吸纳进安全议程以期利用专门的安全政策来进行应对”的发展过程。

安全化理论具有着浓厚的后结构主义和语言学色彩，其立论逻辑参考了卡尔·施密特的“敌我划分”原则，而这一原则又由维夫以“言语行为”理论进行诠释，最终得以为安全问题在当代的再思考提供一种机制上的解读。具体来说，维夫视角下的安全政策类似于卡尔·施密特、乔治·阿甘本等学者所搭建的紧急/例外状态理论，即国家可以决断是否存在需要进入紧急状态的条件，并以此打破常规政治规则，调整政治资源用以处理紧急状态。维夫对这一系列理论的运用及扩展就在于其“言语行为”概念的引入，这里的“言语行为”在社会语言学上指代了一种“表达 - 承认”的关系。在社会环境中，互动行为往往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的内涵，也就是说根据不同人的资源及地位，个体间的互动会有不同的意义与结果。就“言语行为”而言，言语表达的形式与其效果会因社会环境中包括权力关系的变量而受到影响，拥有足够资源及地位的个体，比如学者、政治家，往往能够在结合一些现实条件后做出比普通工人、学生相对更具“认可性”的表述。这便构成了社会中话语知识体系的生产，随着这类知识的传播，这种针对某一事物的特定且反复的言语行为，或话语实践，将形成一套话语秩序。然而，尽管安全化理论在描述政治机制的过程中融入了社会层面的考量，但其实际表现仍类似于米歇尔·福柯的治理术思维。也就是说，安全化理论在话语秩序上着重探索了话语秩序的纵向的建构方式，但其并未真正发掘出在内的横向的传播方式。



话语秩序的规范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话语秩序存在着一种规范性作用。规范指代了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特定行为准则，其形式通常以文化传统、法律制度表现。功能主义研究将规范视作一种“社会事实”，尽管其起源有着不同的观点表述，但作为“社会事实”的规范在“代表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律及向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施以限定”上的性质是几乎毫无争议的。因此，规范必须满足其对社会现状的一种概括，而这也构成了制度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在社会层面上根源。在安全化理论中，尽管维夫探讨了政府可以如何在权力关系中透过“安全威胁”的言语行为来表述事态的严重性并形成相应的规范作用，但他忽略了互动层面中的普罗大众之间的行为。在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中，个体与社会事实的互动并不只是简单的施加支配而是感知与过滤。在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看来，个体会通过个体间的交流来构建意义，而作为社会事实的规范仅是一种会被感知并重新解释的条件。因此，特定的习俗、法律制度对个体的实际作用也需要从个体自主构建的意义中寻迹。戈夫曼也曾以剧场来比喻社会环境，即个体如演员一样会根据剧本和观众来表现自己，但演员的表演并不是完全的同质化，且演员在前台与后台的差异性更体现出了个体行为的复杂性，因而不能将规范的作用一概而论。

对于安全化理论来说，话语秩序的建构固然重要，但这并不应该是安全化的完整发生机制，如何真正在社会领域上激起波澜亦是需要思考的部分。回归施密特的紧急状态论，紧急状态之所以能被界定，是因为政府参照了自己标准来对某种事物进行相应。这种事物在安全化理论中就是“安全威胁”，甚至是影响国家存亡的“事实性威胁”。有了这种对威胁的感知，政府才有了话语构建的基础，即针对特定事物的知识的表述并制定法律政策。相应的，群众对安全政策的接纳程度也应该建立在对这种“事实性威胁”的感知上，由此才能使群众对安全问题的内涵有所感知。因此，当不同的个体能同时对某一事物的感知自主过滤出威胁性后，他们才会更对为“应对威胁”而生的规范有所认同。换言之，当群众被统一到某种“具有威胁性”的事物的对立面是，他们更容易被安全化的话语引导并融入这一秩序中，在受到这一秩序的规范性影响下选择接纳安全政策。而以这种状态为基础，存在相似威胁认知的个体会呈现同质化趋势，并会在交互过程中深化这种认知以及话语秩序引导下的知识内涵，最终使安全政策获得足够强的正当性。

案例分析

为了更好的解读以上安全化机制的过程，我将引入气候安全问题来进行简要讨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气候变化一直是一个国际社会中的热点话题。在联合国框架下，国际社会已经就气候变化领域的诸多部分进行了讨论并制定了相关条约来试图遏制不良的气候变化影响，例如在2016年生效的《巴黎协定》。然而，国际社会从政府到群众对气候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此前都没有达到现如今的高度。在政府层面上，自《京都协定书》签订后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板块长期处在放任自流的状态，环境恶化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缓解。而在社会大众间，否认气候变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在2015年左右，许多人不认为气候变化会是国家社会的威胁。

以英国为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采访数据，48%的受访者在2013年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国家的重大威胁。而到了2022年，这一观点受到了75%的受访者的认同。同样，在绝大多数其他受访国家中，气候威胁在2022年收获的认同率普遍高于2013年的统计（见图1）。此外，依靠皮尤研究中心历年的公开数据，我们也可以发现，人们不仅对“气候变化是国家的重大威胁”这一观点表示愈发赞同，受访者对“气候变化会在未来直接危害个人”的观点也做出了相应。在英国，从2015年到2021年，对个人层面的威胁的担忧从46%的认同率攀升到了71%，这表示越来越多英国人承认气候变化在近几年不仅威胁着作为集体的国家，也同样影响着个人，这便构成了威胁认知的相通性（见图3）。

Concern about global climate change remains at all-time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 who say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a major threat to their coun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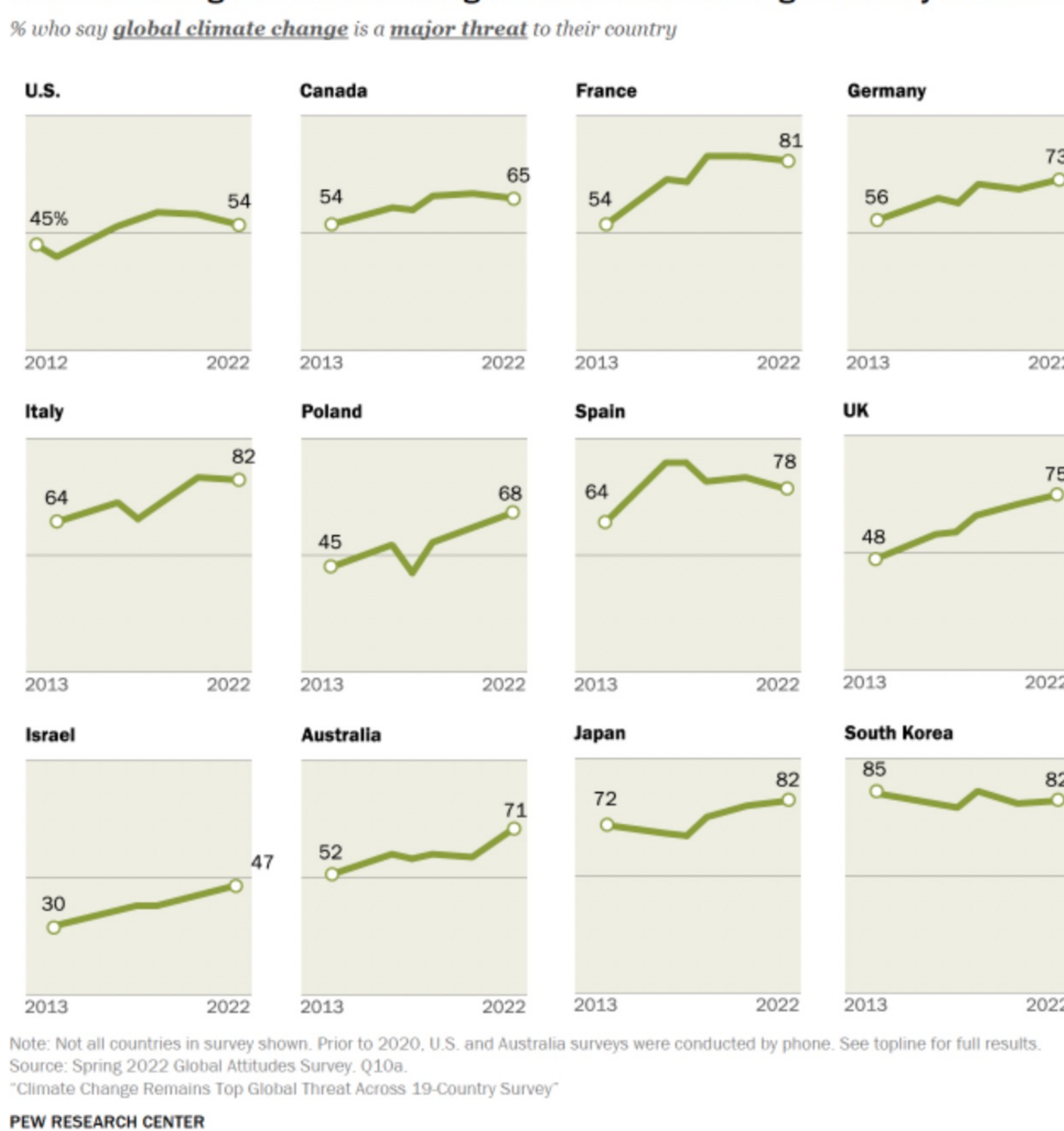


图1. 气候威胁认知（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Concern upon Climate Change's Impact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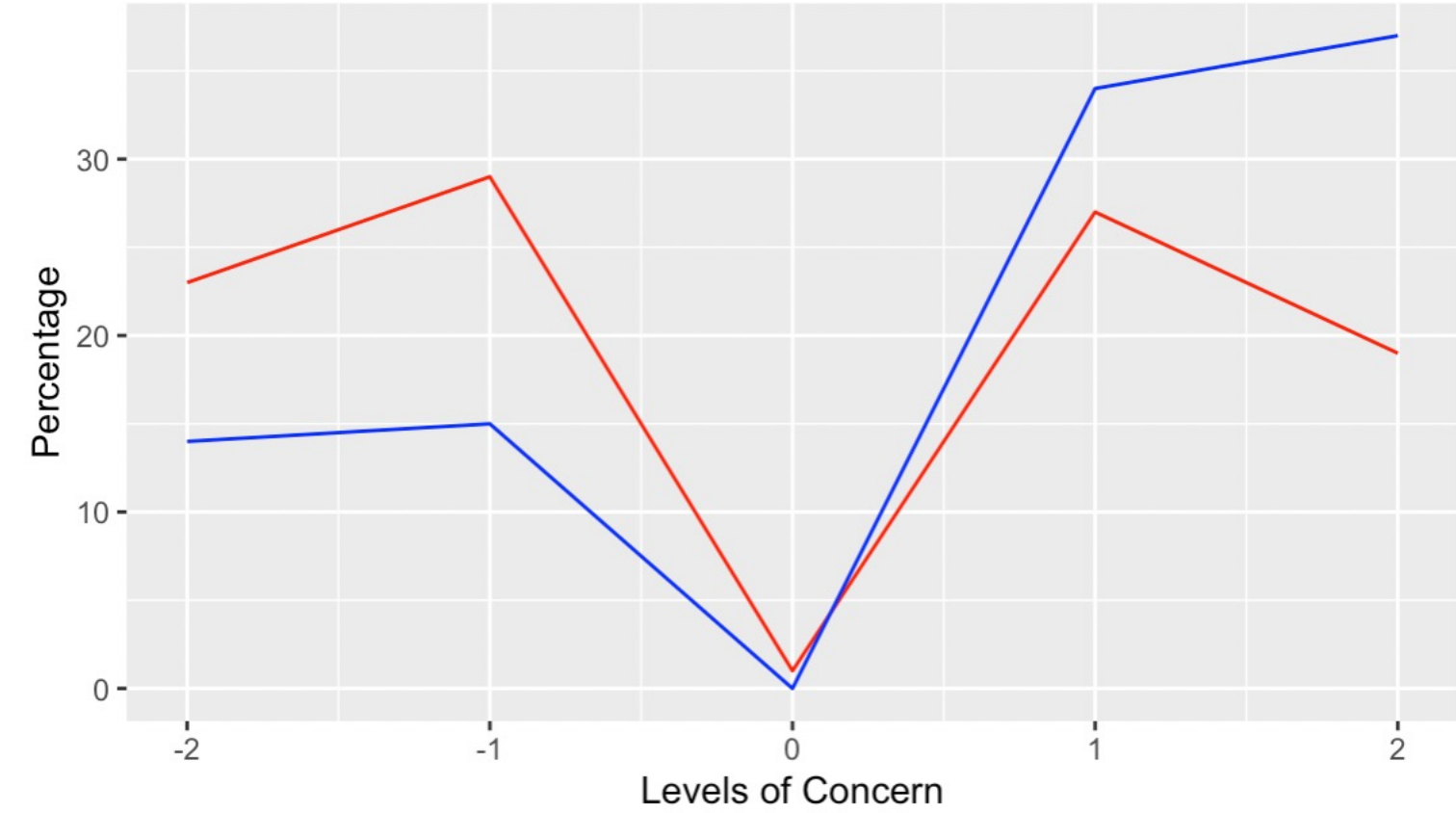


图2. 英国群众的气候威胁认知层级
(红线 - 2015年 / 蓝线 - 2021年)

Concern upon China's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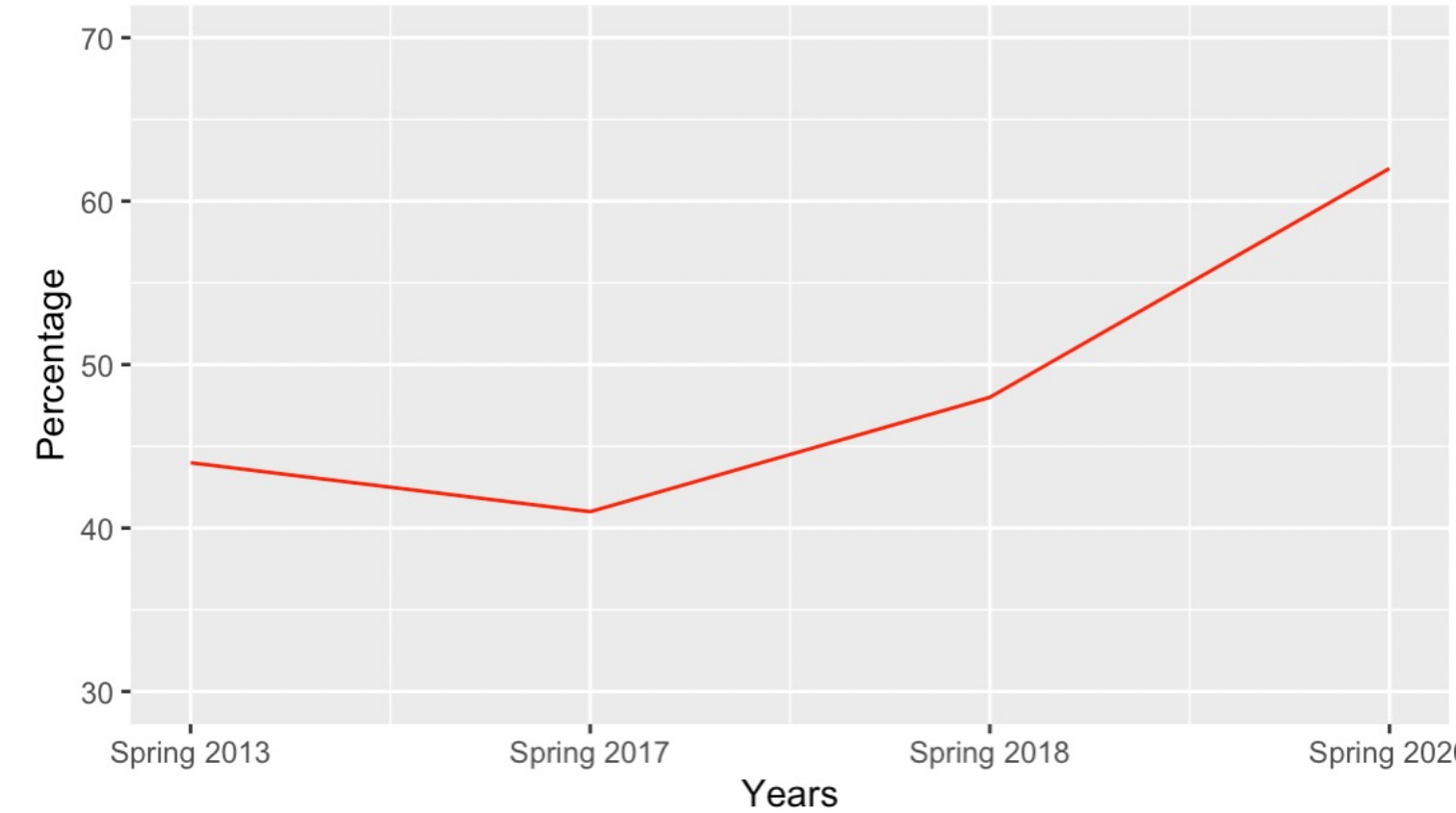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群众的“中国威胁”认知层级

作为最早一批依靠立法手段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英国在政府层面上一直对气候问题保持着高度重视。在2008年，英国议会便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设定了长期的碳排放管控目标及绿色经济转型方案。到了2012年，英国政府建立了英国绿色投资银行，在政府投资的引领下同时带动了私营部门的活力，为绿色经济建设起到了助推作用。随着美国国防部在2014年发言称“气候问题将成为最大的长期安全威胁之一”，英国也在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承认了气候变化的国家安全顾虑，亦将气候与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不稳定、冲突挂钩。此后，尤其是自鲍里斯·约翰逊的首相任期起，英国开始采取规模更加庞大的气候治理计划。2020年，一项投资总额达107亿欧元的“绿色工业革命”计划被推出，进一步强调了对国内经济结构和生产模式转型的要求。同时，在经济转型外，英国也宣布了更具野心的净零排放的目标，并成立科技战略办公室，以强化气候治理层面板块的应变能力。

英国的案例印证了安全化理论在气候安全领域的运用，即在当政府与社会大众享有相似的威胁认知时，群众往往会更受政府安全话语的影响并支持安全政策的实施，最终使政府在相应的安全板块上进行强化的资源分配。与英国的气候政策类似，美国的对华政策态度也同样能够在社会层面上看出端倪。2018年，美国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判定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安全考量重心，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断以贸易问题及科技安全等论调攻击批评中国海外企业。此后几年间，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双边关系持续走低，“中国威胁论”的论调直到现任美国总统乔·拜登上台至今都未曾变动。在民众层面上，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民众的抽样调查也同样显示“中国力量及影响”令他们产生顾虑（见图3）。因此，在相同的安全顾虑面前，群众愈发受到政府的安全话语影响，并将其安全化的“中国影响力”乃至方方面面视作威胁，这便使“中国威胁论”这一话语模式成为了美国对华强化敌对政策，实现了安全化机制的目的。

初步结论与未来方向

从理论及实证案例出发，目前我们可以说明安全化理论在当代安全研究中存在着重大意义，其理论基础为我们提供了串联社会大众与政府决策层的思路，即透过政府在这个时代的言语行为偏好来思考政府对群众的影响及社会各界对国家安全政策的接受度。运用包括政治学、语言学及社会学的跨学科思维，我们探索出了适应上述社会关系的初步研究框架：以现存的数据针对公众意见进行量性分析并与国家安全政策相结合，探索政府与普罗大众是否共享针对同一事物的威胁认知以及安全化话语秩序的知识生产。在现阶段，我们明确了共同威胁认知是安全问题话语秩序建构的基础条件，而这种话语秩序的规范性作用也与威胁认知的程度相关联。随着政府安全话语秩序与民间安全意识的建立，社会层面的确存在着威胁认知扩散的现象，且基于此的安全观如若在群众间获得更多的认可，往往也使相关的安全政策获得强化的机会。然而，我们目前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在理论上思考这一现象的具体发生机制，也就是安全化知识的再生产过程，比如志愿性安全教育、民间研讨会、学生活动等。在这些活动中，我认为存在着一种社会学的仪式逻辑，即通过参与者的共同参与度和活动中传播的共同意识来进行对某种知识的在认知层面的深化。在安全化理论中，我们可以知道政府的安全话语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共同意识上的指导，而群众自发的通过一些具体的聚集性活动在理论上会促进个体对威胁的认知并深化对上层权力所传递的安全话语的理解。举例来说，民间组织的环保活动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参与者们对环境及气候问题的警觉性，而民间组织也时常通过宣传政府或联合国政策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最终实现了在政府指导的语境下的话语知识横向传播，实现安全化思维的再生产。因此，为了更好的了解安全化机制与安全政策的正当性来源，我们仍需要对一些相关的民间活动进行深入调查。